

經濟學研究近二十年的發展—— 兼論臺灣經濟學界在亞洲的相對表現

陳恭平*

從八十年代末到今天，經濟學的學術研究，歷經了極大的變化。這個變化，有的來自方法學 (methodology) 上的基本假設，有的來自研究的主題。在基本假設上，經濟學研究者，不再將「人的決策行為是理性的」這個假設，奉為金科玉律，轉而研究因心理因素所產生，且有規律性的偏離理性的決策行為。在研究領域上，經濟學家除了持續的作較抽象領域的研究外，也漸漸注重較有「實用性」的領域。

一、基本方法學

如眾多社會科學學者所知，經濟學對人類決策行為的一個最基本的假設，也是一個從事經濟學學術研究者的金律，是人類是理性的。這個假設其實包括兩部分。首先，每一個人對經濟體系之內所存在的貨品，都有不同的偏好，而這個偏好，滿足某些在數學上極為合理的行為公設。數學上可以證明，此種偏好，同等 (equivalent) 於一個專屬每一個個人的效用函數 (utility function)。相對的，每一個廠商都擁有一個生產的技術，這個技術限制，規範了廠商的生產可能性。其次，個人和廠商都是「有理性的」(rational)。換句話說，個人的決策行為，即在預算限制下，追求「效用」極大。而廠商的決策行為，即是在技術及資源限制下，追求「利潤」極大。

這個金律，鋪下了以數理方法研究經濟現象的基礎。因為在這樣的假設下，不論是個人或廠商的經濟決策，都等同於數學裡的有限制式的最適化問題 (optimization problems with constraints)。這種數理方法，在半世紀以來提供了經濟學者無窮的機會，利用系統性的方法研究各種經濟 (甚至政治和法律) 的問

*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中心主任

題。但這種取向，也同時帶來了一些限制。首先，在這樣的方法學之下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幾乎已經和數理科學並無兩樣。事實上經濟學和理論物理學，在研究方法及論證方式上，極為類似。一旦任何經濟行為都在簡單而且共同的公設下出發，並利用嚴格的數學或計量方法來證明或證實，它所能研究的問題的範疇就受到很大的局限。一些較有企圖心，較宏觀的研究問題就往往被忽略，其原因就是數理論證，無法「證明」及承載對經濟體系較宏觀而全面性的論述。事實上，經濟學有時被批評為研究的問題瑣碎而枝節。其次，在「最適化」的數學假設下，人類的決策將永遠是理性的，所以在現實中人類所擁有的一些人性特質，例如犯錯、情緒、習慣、懶惰、無知、正義感……等等，都被理論排除在外。因為這種個人或廠商，在競爭市場的假設下，將被「淘汰」。

這個理性假設在八十年代末，開始受到來自經濟學內部及外部不斷增加的挑戰及批判。在為數極多的各種決策實驗（主要來自心理學及經濟學自身）及田野資料裡，不斷地證實人類的經濟決策的確受到很多上述的人性特質、枷鎖、及環境的影響。其中影響最大的，是由 Tversky 和 Kahneman 所提出的「框架理論」(prospect theory)。該理論很有說服力的說明人類的決策，有系統性的受到與問題本質無關的外在環境的影響。而這影響所產生的決策偏誤，在以往概以「不理性」為由而遭忽略。但現實的批評和證據，在得到越來越多新一代經濟學家的認同之後，終於促成了行為經濟學 (behavioral economics) 這個重要領域及方法的興起。值得注意的，是這個方法上的改變，並不是拋棄了原有的數理論證方式，而是痛快地承認人類的決策，常會受到自身理性限制及環境的影響。更重要的，在行為經濟學家的研究裡，人類決策的不全然理性，並不是隨機或偶發的，而是也遵循某種規律的。¹ 當我們承認人類在經濟決策的理性限制後，就必須重新檢討過去對經濟政策和廠商策略的各類理論。例如，政府的各種政策的改變，不只必需考慮到人民的策略性反應（免費的健檢一定大排長龍），也必需考慮到人民的非策略性反應（善意但複雜的減稅政策可能效果有限）。廠商也會利用消費者的各種理性弱點，設計出一些訂價政策來獲取更大的利潤（例如，長期訂購的產品，如果消費者沒有於到期日前一週主動表明取消，將自動續約）。行為經濟學的影響力及其所引起的共鳴，不只局限於學術界，也及於對經濟及管理有興趣的一般大眾。由最近五、六年來，坊間所出版的類似「誰說人是理性的」這類書籍不下十本的狀況，就可以得到證明。

¹ 限於篇幅，本文無法對行為經濟學做較詳細的介紹。有興趣的讀者，請見陳恭平（2009），〈人非聖賢——簡介行為經濟學〉，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，10 卷 4 期，頁 16-28。

二、研究主題

除了上述的基本方法學之外，經濟學的研究主題，在近二十年來也產生相當程度的位移。在此之前，貨幣與財政政策、經濟成長、勞動經濟學等領域，占了研究相當的比例。但在今天，經濟學家比較感興趣的，是當初被認為是冷門的一些領域，尤其是醫療經濟學（health economics）及教育經濟學（education economics）這兩個原本不被認為是屬於經濟學範疇的領域。

以經濟學門引用率最高的兩個旗艦期刊為例。按筆者自己的分類統計，在 1997 年，醫療、教育及行為經濟學三個領域的論文，占 *American Economic Review* 當年刊登總論文數的比例，各自為 0/64，0/64，及 5/65。到了 2016 年，它們的比例增加到 13/130，6/130，及 12/130，三個領域共占當年總數的 1/4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經濟學門的研究次領域極多，這是一個極高的比例。同樣的趨勢，也表現在另一本期刊 *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* 上。在 1997 年，上述三個領域的論文所占比例為 0/49，0/49，11/49。² 到了 2016 年，其比例則為 4/40，3/40，3/40。這個趨勢，如果我們再回溯十年，就可以看得更清楚。上述三個領域於 1987 年在 *American Economic Review* 所占比例為 1/97，2/97，2/97，而在 *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* 所占比例，則全為零：0/50，0/50，0/50。

這個現象所產生的原因，筆者認為和各國政府（尤其是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）這二、三十年來，在醫療及教育支出的大量增加有關。與這個趨勢相對應的，是在計量經濟學的發展上，政策評估（program evaluation）的計量方法也成為顯學。另外一個可能的因素，是經濟學者在這期間不斷的反省半世紀來的數理傾向，是不是走過頭了。畢竟，經濟學曾經是一個極端實用的學門。偉大的經濟學者凱因斯（J. M. Keynes）當初就曾認為，經濟學家對社會的功能，應該和牙醫一樣有用。³ 但過去這半世紀過分數理化的結果，讓太多的經濟學者，投入美麗而典雅的理論以及研究方法和模型的追求，而忽視現實政策的探討。這個趨勢，在近二十年來有了轉變。優秀的經濟學者紛紛投入政策或現實的經濟問題裡。著名的經濟學者 Joseph Stiglitz 等人，也在 2004 年創設了 *Economists' Voice* 這個廣受媒體注目的期刊，專門刊登經濟學家對現實政策的見解、建議及辯論。Hal Varian, Steven Levitt, Alvin Roth, Abhijit Banerjee, Paul Milgrom, Paul Klemperer, Esther Duflo 等當今最優秀的經濟學者，也同時都是傑出的制度設計

² 1997 年該刊有一期行為經濟學的專刊，當年的 11 篇論文均出自這個專刊。

³ If economists could manage to get themselves thought of as humble, competent people on the level with dentists, that would be splendid.

和檢討的學者。Dulfo 甚至將她最近的一篇論文，取名為“The Economists as Plumber”。很明顯的，這是一個將要持續多年的趨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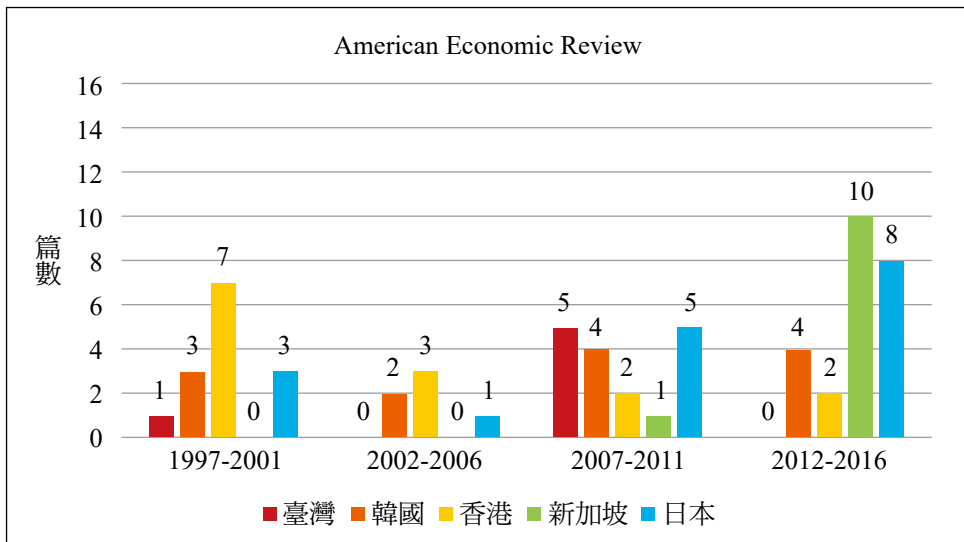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臺灣的經濟學的研究表現

眾所周知的，臺灣的大學教師薪水，遠低於亞洲其他同等經濟發展的國家或地區，更遑論英美等國。在美國及中國大陸，經濟學教師的薪水，甚且遠高於其他學門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很多臺灣在國外著名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優秀留學生，即使將學術生涯的重心放在亞洲，也早已不將臺灣作為主要工作地點的選擇。與此同時，亞洲地區經濟學的研究能量，也在這二十年來快速成長。事實上，在全球競爭極為激烈的經濟學門頂級期刊裡，亞太地區的學者，已是發表論文的常客。亞太地區學者的研究動能，已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。相對於這些發展，臺灣經濟學者的學術研究表現，相較於亞洲其他地區，究竟如何？全球經濟學術界，以頂級期刊的論文刊登（及引用）作為主要學術成就的衡量標準，幾乎已是共識。也因此筆者做了一個簡單的統計，計算了自 1997 年至 2016 年的二十年間，臺灣、韓國、香港、日本及新加坡五個地區的學術單位，刊登於經濟學界公認的五本旗艦期刊的論文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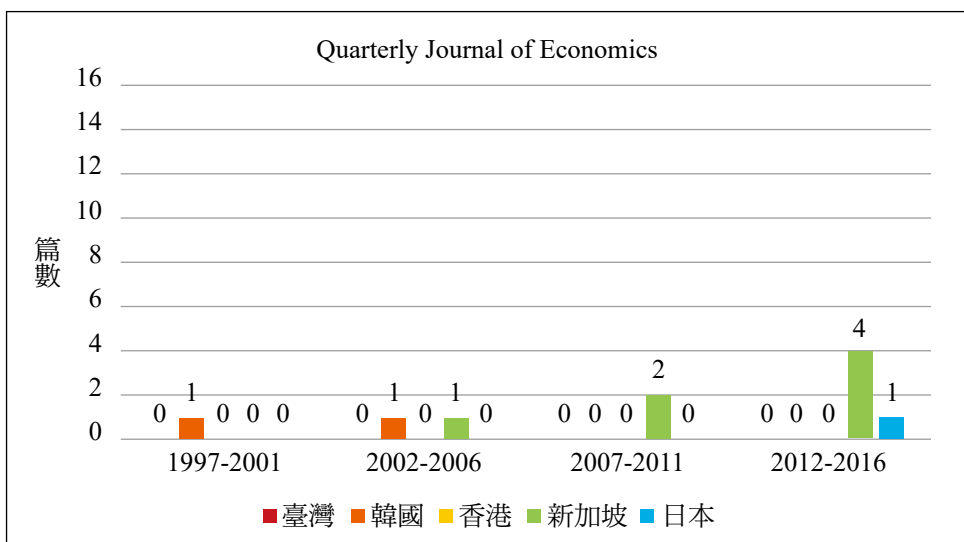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至五為五份期刊分列，圖六為五份期刊論文數的總和。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，相對於其他地區，臺灣在頂尖期刊的論文數，的確是落後的。另外，由圖六可以看出，除了世紀之交亞太地區因短暫的絢爛致使世紀之初的表現下滑外，基本上總論文數是穩定上升的。最後，臺灣的表現原優於新加坡，但已被超越。事實上，新加坡的論文數，已是亞洲最高。檢討之下，上述的薪資差異所造成的人才吸引條件，固然是重要因素，但人口數和國際化的程度，也應該是影響因素。日本自不待言，韓國的學術人口，也高於臺灣。但香港和新加坡的優勢，除了遠高於臺灣的薪水外，也在於其深度的國際化。香港及新加坡的大學教師，當地人所占的比例相當低，而是以香港及新加坡地區外的學者為主。以開放的態度全球舉才，才是這兩地的學術表現如此亮眼的主要因素。

但筆者要強調的，是臺灣經濟學者在頂級期刊的論文刊登數，雖不如其他四個地區，但論文刊登數（即便是頂級期刊）並不能完全代表經濟學者的學術貢獻。臺灣的經濟學者，對經濟政策的關心和影響力，相較於其他上述地區，應該是非常高的。以香港為例，大學裡的經濟學者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建議及影響力，據筆者所知是幾乎不存在的。臺灣的經濟學者，對社會及政策的影響，並不能完全由上述的期刊發表數所顯現。一個明顯例子，是由中央研究院出版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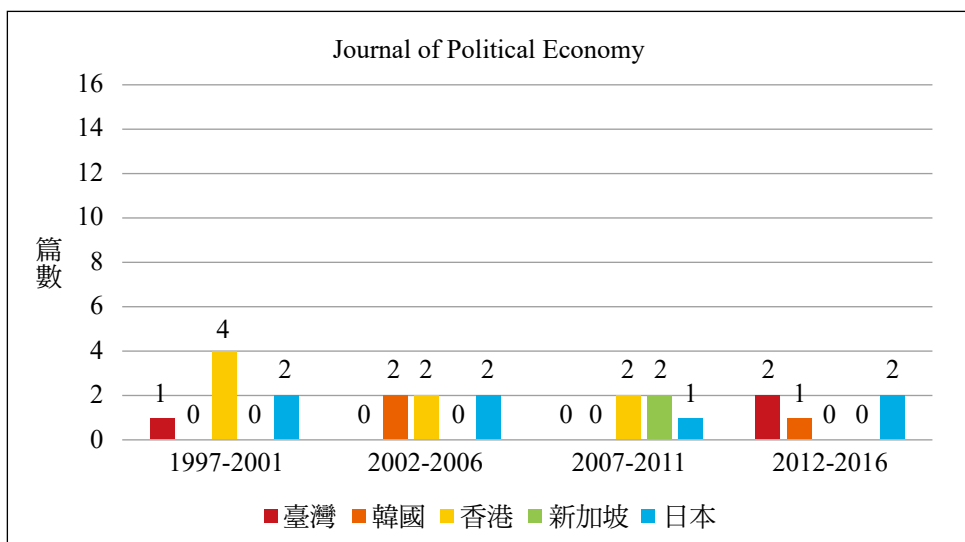
經濟研究所主導，於 2004 年所出版的「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」。這本建議書，非常清楚地說明了臺灣賦稅的現狀、面臨的問題、也提出了極為中肯的建議。這是經濟學者關心並提出經濟政策建議的具體表現。誠然，經濟政策必然要是所有利益集團，經過政治程序角力的結果。但在這個複雜的環節裡，很多臺灣的優秀經濟學者已經善盡自己的義務。另外一個例子，是臺灣經濟學會，從 2014 年開始，創設「臺灣經濟研究傑出論文獎」，鼓勵對臺灣實際經濟問題及政策的研究。對現實經濟及政策的關注及影響，才是臺灣的經濟學者，相對於其他地區的最大優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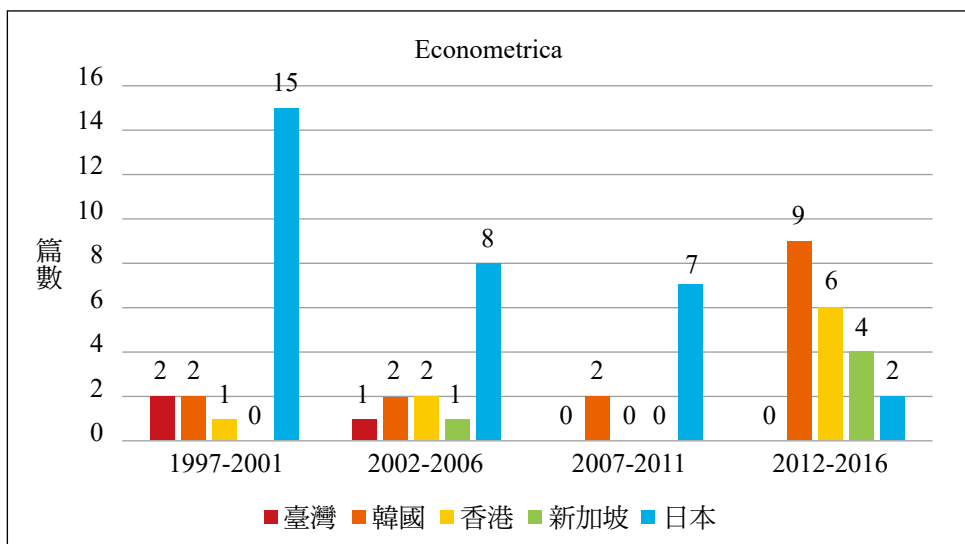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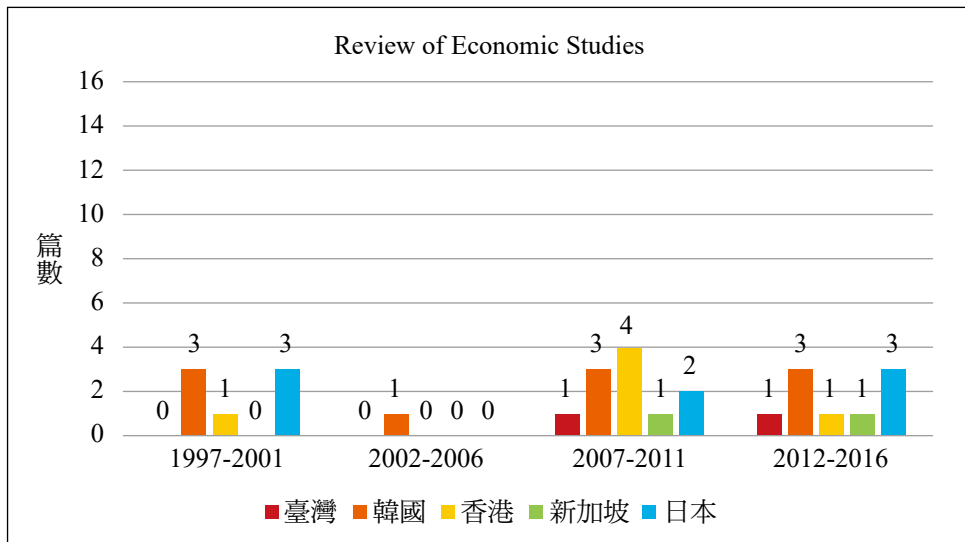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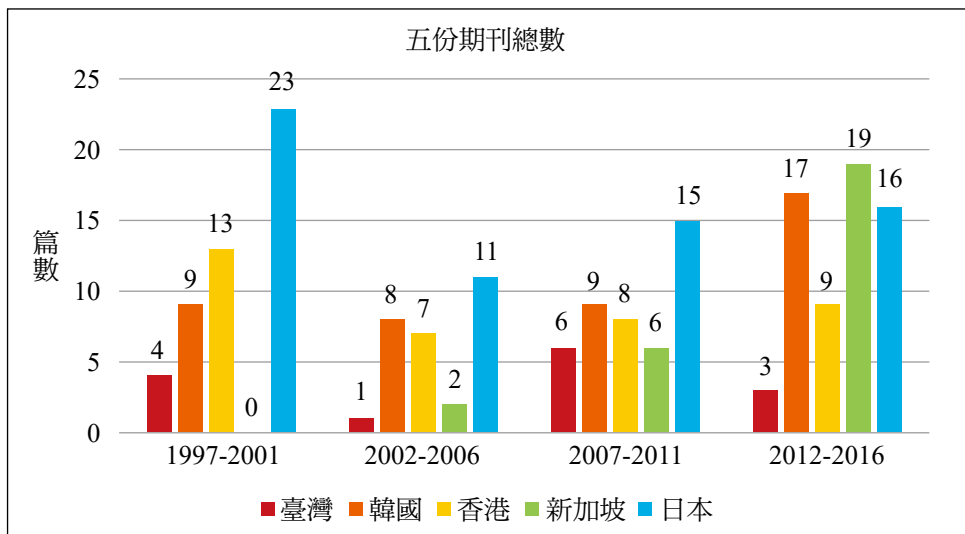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



圖四



圖五



圖六